

胡耀邦及其時代

——評高勇《我給胡耀邦當秘書》

● 李湘寧、楊龍

在官方，關於胡耀邦的史料編撰(傳記、年譜等)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即使在與胡有着諸多交集的中共領導人的傳記、年譜之中，與胡相關的人事也往往被一筆帶過或簡略處理。



高勇：《我給胡耀邦當秘書》(香港：三聯書店，2014)。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15-1989)離開人世已經二十六年了。在這二十六年裏，關於胡耀邦的歷史書寫卻呈現出一個悖論的現狀：在官方，胡耀邦是一個未被否定但

又帶有一定禁忌的中共黨史人物；在民間，胡耀邦偉大的人格魅力和改革魄力是普羅大眾不斷追憶的對象。

在中共體制之外，雖然不少人致力於編撰和再現真實的胡耀邦，但由於史料限制，這些研究相比於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研究而言，還顯得相對薄弱。在官方，關於胡耀邦的史料編撰(傳記、年譜等)更是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甚至和其他同等重要的中共黨史人物相比，胡的歷史呈現亦顯得相對單薄。即使在與胡有着諸多交集的中共領導人的傳記、年譜之中，與胡相關的人事也往往被一筆帶過或簡略處理。茲舉一例，1965年6月，胡耀邦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任上，因為「糾左」而陷入陝西省委和西北局的圍攻和批判，葉劍英前往陝西視察工作的同時，出於保護胡的考慮，讓其向西北局和中央請假，並將他同機帶回了北京^①。但是，這一情節在《葉劍英年譜

(1897-1986)》的相關部分中，只記述了葉在西安召開的全軍工程技術院校教學改革會議上的講話^②，對胡卻未有任何提及。

有鑒於此，高勇憑藉自身的親歷和掌握的資料，撰寫的《我給胡耀邦當秘書》(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在史料上有相當精彩的呈現，在推進胡耀邦研究以及對我們近距離地理解胡耀邦有着重要的史料價值。陳寅恪嘗言：「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比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③其實研究政治人物的歷史，更需要與其處於「同一境界」，方能真正理解其行為，凸顯行為背後的主觀意識，再現其與所處之時代的真正關聯以及其對時代的意義。高勇的回憶錄在這方面很好地發揮了這一功用。

高勇從1959到1964年擔任胡耀邦秘書(頁7-83)，並於1966到1969年的文革歲月中和胡長期共處(頁87-131)，之後，直到胡逝世，都與其保持了一定的聯繫。所以高勇與胡有着密切的接觸，有着切身的了解，這為我們更加確切地理解胡耀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一手材料。《我給胡耀邦當秘書》一書中關於1959至1964年、1966至1969年間的相關記述，特別具有這一方面的價值。

因而，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着手：一是為了更全面地呈現本書的史料價值和理解胡耀邦研究的處境，有必要回顧中國大陸胡耀邦史

料的公布及研究狀況；二是本書涉及到1959至1964年間不少胡耀邦私下談話、公開報告和撰寫文章的過程，通過分析這些史料，可以很好地呈現此一時期胡與中共政治文化若即若離的狀態；三是高勇在文革前期曾與胡耀邦共處，故而對胡在此一時期的種種際遇有着清晰的了解，通過敘述這一時期胡個人的所為，可以一窺其沉浮與黨內人事的關係，以及其個人行為背後的「苦心孤詣」。

一 當代中國大陸胡耀邦的資料編撰與研究

高勇於1998年底曾將自己所撰寫的關於胡耀邦的回憶錄，通過中共黨史出版社遞交審查，以期出版，只是在審查過程中被一位「老幹部」所擱置(〈前言〉，頁2-3)，最終不得不轉至香港，於2003年以《胡耀邦主政團中央》為名出版^④，此即同樣在香港出版的《我給胡耀邦當秘書》一書的前身。這也引出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胡耀邦作為曾經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何以其相關著述的出版如此之難？在中國大陸，關於胡耀邦的知識生產狀況和中共黨史編撰、政治意圖有着怎樣的聯繫？

其實，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胡耀邦的文選、年譜和對其的著述、回憶等，可謂是汗牛充棟，其中既有中共高級幹部(如原中央黨校的吳江)的專題回憶錄^⑤；亦不乏專題文集收錄多位中共高級別官員(如張愛萍、李銳等)的回憶文章^⑥。而《我給胡耀邦當秘書》一書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究其原

胡耀邦作為曾經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何以其相關著述的出版如此之難？《我給胡耀邦當秘書》一書難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究其原因，還需要回到中共黨史編撰背後的政治動因。

胡喬木繼承了鄧小平與李鵬等人的談話精神而非趙紫陽悼詞的定性，他的觀點對於中共黨史的官方編撰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至少在2009年以前，直接以胡耀邦為主題的著作中，沒有一本來自中共中央一級黨史編撰機構。

因，還需要回到中共黨史編撰背後的政治動因。

1989年4月22日，即胡耀邦逝世一周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悼詞中，肯定了胡的一生，並沒有作任何的負面評價，並迴避了以往認定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一事^⑦。加之，雖然胡逝世兩年多前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但依然是中共中央第十三屆政治局委員。按照以往慣例，其著述、傳記和年譜應該依次編撰，以體現其在中共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在4月25日，鄧小平私下找李鵬等人談話分析學生運動大規模爆發的原因時，又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反對精神污染剛開展不久就被丟掉了，這是導致思想界、教育界混亂的原因^⑧。此次談話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這又部分地否定了胡耀邦的工作。眾所周知，胡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中共公開解釋的重要原因就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和「反精神污染不力」^⑨。

鄧小平所講的畢竟屬於個人意見，而非全黨的集體決定；真正在中共黨內具有正統地位的還是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的悼詞，其具有以組織名義對胡耀邦一生「定調」和「做結論」的性質。或許是出於這個原因，1989年短暫地出現了胡耀邦出版熱，有數家出版社推出了帶有紀念性質的胡耀邦紀念文集和傳記^⑩，此外，美國學者楊中美和日本學者和氣弘關於胡耀邦的譯著亦相繼問世^⑪。從政治史的角度，這些材料所能提供的史料十分有限；但是從政治文化史的角度，

配合其他資料，將這些材料視為當時編撰和閱讀之人對胡耀邦及其時代的一種政治認同、政治記憶，或許能產生不少有新意的研究。

不過，繼鄧小平之後，胡喬木於1991年為紀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而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建黨七十周年作〉一文中，對於「八九」的解釋，則繼承了鄧小平與李鵬等人的談話精神而非趙紫陽悼詞的定性，不點名地指出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防止社會主義事業變質這一問題，而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共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對於執行這個方針並不是始終一貫的，給了西方一部分敵對勢力和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可乘之機，終於爆發成為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情^⑫。

由於胡喬木長期以來都是中共理論宣傳戰線的掌舵人，他的觀點對於中共黨史的官方編撰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對此後胡耀邦的史料編撰和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在查閱所有關於胡耀邦的資料和著述後，可以確切地得出結論：至少在200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直接以胡耀邦為主題的著作中，沒有一本書籍來自中共中央一級黨史編撰機構，而是基本來自於胡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曾經共事的朋友和感念他的學者所撰寫的回憶文字和著述。

1990到2004年，中國大陸的胡耀邦出版幾乎陷入了沉靜的狀態，僅有少數書籍得以正式出版。1994年，四川省南充市政協以專題形式，出版了一部回憶胡在川北期間的種種事迹的資料集^⑬；1997年，

紫紅霞等人在「謀略系列叢書」中出版了一部《胡耀邦謀略》^⑭；同年，原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工作人員沈寶祥出版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⑮；1998年，原新華社記者戴煌出版了《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⑯。沈寶祥和戴煌的著作資料詳細，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出版的比較嚴肅的、高質量的胡耀邦研究專著。

自2005年以來關於胡耀邦的出版物才有所增加，其原因是2005年11月，恰逢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在北京召開的胡耀邦紀念座談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大部分內容其實重述了1989年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的觀點，也未提及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⑰。同年，胡耀邦之女滿妹出版了兼具回憶和研究性質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⑱；原《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等主編、唐非撰寫的《胡耀邦傳（1915-1976）》第一卷亦相繼出版^⑲。這些著作不論在寫作上還是新資料的提供上，都有了較高水平的呈現。

2009年之後，關於胡耀邦的出版物開始呈現多元的趨勢，這種多元不僅包括內容，還體現在編撰機構方面。2009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韓洪洪出版了《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⑳；2011年，胡之子胡德平出版了《中國為甚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㉑；2012年，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主編了《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㉒；2014年，沈寶祥又出版了《親歷撥亂反正》^㉓；同年，陝西《安康日報》社資深編輯李大斌出版了早已寫就的《1965：

耀邦早春行》^㉔。據悉，在即將到來的胡耀邦百年誕辰之際，中央黨校正在組織編寫和出版一本涵蓋胡耀邦在黨校任職期間講話、活動和批語的著作^㉕。

以上基本上是中國大陸胡耀邦資料編撰和研究著作出版的狀況。其實，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由於鄧小平、胡喬木對胡耀邦一個短暫時期具體工作的批評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即中共黨史的編撰和中共領導體制的內在關聯。1989年6月，鄧小平同江澤民等人談話時直言^㉖：

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理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

所以，胡耀邦的史料公布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這一中共領導原則的制約，因為按照這一原則：第一，胡耀邦只是鄧小平主持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一員，其歷史事迹的公布要以鄧這個核心來展開，所以如何讓胡的史料處理符合他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一員的位置，而不能有較大的突破，殊非易事；第二，從第二代領導集體到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更迭，胡在中共黨史中的重要地位就必然要遭到「忽視」，因為這涉及到如何解釋1987年初胡的突然辭職，以及如何解釋第三代領導集體「接班」的合法性，這些都是在現有的黨史編撰框架下無法圓滿解決的。而縱觀出版於中國大陸之外的相關回

胡耀邦的史料公布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兩個領導原則的制約：一、如何讓胡的史料處理符合他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一員的位置殊非易事；二、從第二代到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更迭，胡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就必然要遭到「忽視」。

憶錄和史料，其實都不符合這些「政治要求」，故而關於胡的一些著作謀求在中國大陸出版時，自然是異常困難的。當然，這一點同樣是我們閱讀中共領導人的相關史料時，不能不引起極大注意和予以警惕的。

二 文革前的胡耀邦與中共的黨文化

回到胡耀邦的歷史本身來看，中共的領導幹部和機要秘書很多時候是通過文件、會議等發生緊密聯繫的，在這些日常事務中，能夠看到黨的運作邏輯、黨文化在日常事務中的瀰散，這為我們捕捉當時胡和中共的主流黨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極好的素材。

1959年3月初，高勇經團中央組織部的安排，正式成為胡耀邦的機要秘書，主要負責處理機要文件、接聽電話及日常事務。所以，高自然得承擔起看文件、選文件、送文件的工作，據其回憶，在承擔工作初期，由於自己沒有經驗而無法有效地劃出需要的重點，這其實是因為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的文件都有「高手」寫作，所以要找到真正的重點殊非易事（頁9-12）。

同時，在看文件上，有不少反映社會問題的「暗面」材料，也有不少國際社會批評中國的負面材料，這些都要在整理後呈交胡耀邦閱讀。在大躍進期間，整體氛圍是比較激進的，但是胡告訴高勇：

反映國內情況的這些《內部參考》材料，都是一些極端的個別事例，集中一起看，感到不得了，其實，這不是黨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國家這

麼大，總有一些不好的東西……至於國外的材料，像《參考消息》上的東西，只能作參考，那些材料中大量的資產階級的觀點，主要是看他們怎麼說的，了解他們對一些事情的反映……但是思想上不要跟着他走……（頁13）

就當時的政治環境而言，胡對於這些材料的看法，顯示出他看待問題的態度比較遠離當時中共黨主流的「敵我分明」的政治氛圍。

其實，胡耀邦這種對事的態度，也體現在他對人方面。1959年5月，胡到河北省安國縣參加勞動，並看望在那裏下放勞動的一批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幹部，這批幹部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劃分為「中右」，在當時的環境下，對於「右派」和「中右」，大部分中共領導幹部是避而遠之的，而胡在了解到他們長期吃不飽的情況以後，同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等談及，「你們應該買點餅乾之類的，讓大家晚上悄悄加點吃的，群眾也不是完全靠食堂，晚上回到家還不是要偷偷做一點吃！」（頁51）可見，胡耀邦在對人方面並不以「身份」劃線。

看文件和材料是中共領導幹部了解外部情況最重要的途徑之一，胡耀邦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和團中央的第一書記，自然免不了要和其他中央機構及部委打交道，所以他深諳中共的「文件之道」；同時，他對於「暗面」的材料和形同國家敵人的「右派」確有着開放的態度，並不把存在的負面問題上綱上線，而是認識到國家大了就會有一些不好的方面，這又是他的不同之處。

在寫文件和學習歷史上，胡耀邦和當時黨的整體氛圍亦有相當不

在看文件上，胡耀邦看待問題的態度比較遠離當時中共黨主流的「敵我分明」的政治氛圍。他深諳中共的「文件之道」；同時對於「暗面」的材料和形同國家敵人的「右派」確有着開放的態度，並不把存在的負面問題上綱上線。

同。1961年初，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胡回到團中央後，找到了高勇，告訴他「賈寶玉也是搞調查研究的」，然後介紹了《紅樓夢》第三十九回的相關情節，希望高勇能將其改編壓縮成一二百字的故事，以方便他在講話或寫文章時引用（頁15-16）。講話或寫文章要引經據典以說明相關的問題，在當時的中共黨內很流行，這跟毛熟讀古籍並經常引用有着密切的關係，但胡也只是形似而已。

自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居於中共權力的中心，其處事作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整個中共，構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在引經據典上，毛時常是有所指的，尤其是對人有所指。比如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為了分散來自劉少奇等人的批評，引導與會人員去批評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的負責人；在談到中共黨的民主集中制時，他非常直接地用劉邦和項羽的例子，指出各級黨委的第一書記存在獨斷的問題，並稱：「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②結果毛的這一講話，引發了與會人員對中央各部委、省委負責人的大範圍批評，還導致事實上已經對大躍進剎車的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被解除職務^③。

其實，這恰恰突顯了胡耀邦和主流黨文化的神離之處，胡在引經據典時，就沒有那麼強的對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指向性，只是要藉此說明某事而已，正如他的政治秘書劉崇文回憶，即使是觀念相對保守而

且深味民生疾苦的李先念，對胡的評價也是陽的多陰的少，並找理由未回北京參加1987年1月召開的為胡辭職做準備的黨內「生活會」^④。

胡耀邦「對事不對人」還體現在他學習古籍態度和方法上。1962年，他讓高勇用兩個星期時間將《昭明文選》中的〈傅毅傳〉註釋出來，完成註釋後，胡還與其逐條討論，其間，繼而讓他註釋了皇甫湜的〈論業〉，並將這些註解印發給共青團系統的幹部以作學習之用（頁16-18）。事後，胡解釋這是為了逼着高勇學習以提高其文化水平。而毛澤東慣於推薦相關史籍供他人閱讀，其中一些是有非常強的指向性的。1972年，毛提醒王洪文閱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其直接的用意當然不是要王學習知識以提高文化水平，而是「敲打」他，希望他不要成為第二個扶不上「帝位」的劉盆子^⑤。

不管是看文件，還是講話和寫文章，胡耀邦和當時主流的黨文化在形式上有着相似的方面，但在實質內容上又有着根本性的區別。同樣，在會議發言這一問題上，他也有着相當不同的認識和表現，當然，這些還是在中共組織慣例許可的範圍之內。1959年7月底，胡被請上廬山，參加批評彭德懷的會議，這本是一個向毛澤東表達忠心的機會，林彪、陶鑄等人就很好地抓住了這次機遇^⑥。而胡卻只是在小組會議上做了一個表態性的發言，籠統地表示要「擁護主席講話」，「擁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而沒有具體地揭批彭德懷等人。這自然不能得到毛的認可，按照胡本人的說法：「廬山會議後，主席有一兩年不大理

胡耀邦在引經據典時，沒有毛澤東那麼強的對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指向性，只是要藉此說明某事。不管是看文件，還是講話和寫文章，胡和當時主流的黨文化在實質內容上有着根本性的區別。

胡耀邦既諳熟中共黨的文件文化，又和黨的鬥爭文化保持距離；既深明黨內發言之利害而有謹慎處理的一面，又遵從黨的文化慣例而有保護上級、為之掩護的一面，由此可見胡與中共黨文化若即若離的關係。

我，給我坐了冷板凳哩！」(頁81-83) ②胡自小參加革命，自然明白這種會議發言的利害關係；不作具有實質性內容的發言，不揭發批判他人，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當然，胡耀邦也有遵從中共黨文化慣例的一面，比如在包產到戶一事上主動替鄧小平「打掩護」。1962年7月，鄧在團中央召開的三屆七中全會上講到了包產到戶，並表示要把能夠比較快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生產關係鞏固下來，言下之意是肯定包產到戶。但事後不久，鄧得知在其講話的前後，毛澤東在地方上做調查時強調要鞏固集體經濟，反對包產到戶。這意味着鄧的講話和毛的最新想法是矛盾的。所以鄧打電話給胡，要求其把包產到戶的相關講話記錄刪去，不要向下傳達，並加上強調鞏固集體經濟的內容。之後，胡按照鄧的說法做了傳達(頁75-76)。此時，毛推動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的決心已經非常堅定了。7月23日，毛批准將鞏固集體經濟的決定草案交由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7月31日，毛批示並准許了鄧轉來的陳雲同意鞏固集體經濟的決議草案，但陳提出由於心臟病因而不能參加在北戴河召開的各類會議③。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進一步保護鄧，胡在8月初，繞開團中央書記處，在以個人名義送交毛和中央的報告裏，進一步突出鄧在講話時特別地轉達了毛關於鞏固集體經濟的想法(頁75-77)。這反映出了鄧和胡關係親密的一面，但並不等於胡對鄧是無條件順從的，否則就不會有1980年代的諸多分歧了，胡鄧關係也需要放到歷史進程的每一個事例中加以詳細分析。

通過高勇的回憶錄，可以看到一個多面的胡耀邦：他既諳熟中共黨的文件文化，又和黨的鬥爭文化保持距離；既深明黨內發言之利害而有謹慎處理的一面，又遵從黨的文化慣例而有保護上級、為之掩護的一面。從這些立體地呈現了胡在文革之前的諸多事迹和行動中，可以看到胡與中共黨文化若即若離的關係。

三 文革前期胡耀邦的個人堅守

高勇關於1959至1964年間胡耀邦的記述再現了胡與中共黨文化的關係，而關於1966至1969年間胡的記述，則能夠讓我們理解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在失去權力以後，在極端的環境之中，他的個人處境與波雲詭譎的政局變動的關係，以及他的個人堅守。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揭批了彭真、陸定一和羅瑞卿等人，這是文革正式發動的重要時間節點④。政治局勢已是山雨欲來，身處北京的胡耀邦不可能不有所風聞。但在1966年夏初，高勇去看望胡耀邦時(此時他主要是在北京養病)，高說到《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本意是講中小學生游泳要注意安全，但卻強調突出政治，胡反應說：「游泳突出甚麼政治！游泳應該突出鼻子，不然就會嗆水！」(頁89)。此番言論，用當今中國的網絡語言來說，就是標準的「吐槽」(即找一個切入點挖苦某事)。

6月，中共再度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北京市中學的文革由

胡耀邦主持的團中央負責，隨後，團中央組織了1,800多名團幹部，組成300多個工作組，向北京八個學區派出(頁95)。7月18日，毛澤東回北京後批評派工作組，這也成為後來團中央在中央機關中首先被改組的重要原因³⁵。8月初，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受到了毛的大力讚揚之後，共青團主管的《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無產階級的大字報萬歲〉的社論，胡閱後不同意發表，並反對《中國青年報》使用「革命小將」等詞(頁103)。

由上可見，不管是在私下場合，還是其所主管的共青團工作之中，都足以看出胡耀邦對於已經展開的文革，在內心深處是極為抵觸的，但這種抵觸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8月4日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不但批評了向學校派工作組，還點名批評了團中央：「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³⁶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周恩來批評團中央在中學工作上有直接責任。接替彭真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李雪峰為了推卸對北京市中學派工作組的責任，也順着周恩來的講話，點名嚴厲批評以「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為首的團中央：「搞了這麼久，幹甚麼？就幹了一件事：鎮壓革命的學生運動，主要是這個。」還表示「三胡」也可以罷官，由負責領導團中央工作的李富春去處理³⁷。

在這次全會的前後，紅衛兵開始衝擊共青團辦公地。8月13日，紅衛兵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批評團中央的錯誤問題。剛成為政治局常委並負責聯繫共青團工作的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

改組團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散會後，一隊紅衛兵將胡耀邦從家裏帶到團中央辦公地，高喊「打倒胡家店」³⁸。8月15日，李富春進一步在團中央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宣布改組團中央，之後成立了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下設各類戰鬥組取代原來的辦公機構(頁106-107)。

在高勇的記述中，李富春是有意針對胡耀邦及團中央，其實李不過是執行毛澤東的旨意罷了。毛只是在北京市委之外，要再拿共青團開刀，以推動文革展開，這事恐與李個人意圖無關。茲舉一例，1967年2月4日，根據高勇的回憶，李富春接見共青團相關負責人時，提出「胡耀邦的問題要徹底批判，胡耀邦不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十幾年來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執行劉鄧路線的」(頁115)。而據一段公開的文革史料，與此有着近乎相同的說法，其中還提到：「劉鄧對團中央的講話指示要清理一下。批判胡耀邦，你們發動中層幹部，這還是個發動，要深入，不破不立，不徹底批判就不能立起來。」³⁹只是這份史料並未註明李富春講話時間。

這其中存在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李富春究竟何時做了這個講話。李在歷史上和胡耀邦並無個人恩怨；同時，胡長期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李和鄧自1920年代初在巴黎勤工儉學以來，關係就極為密切。1973年2月，鄧重返北京之後，親自第一個去拜訪的就是李富春夫婦⁴⁰。李鼓動團中央機關的造反派批鬥胡並無個人的主觀動因⁴¹；加之，就在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來召開的中央碰頭會上，李因經常與國務院的幾位副總

在高勇的記述中，認為李富春是有意針對胡耀邦及團中央，其實李不過是執行毛澤東的旨意。毛只是在北京市委之外，要再拿共青團開刀，以推動文革展開，這事恐與李個人意圖無關。

相比於李富春，胡耀邦在文革中的行為，從參加批鬥會到寫材料，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堅持中共相對正面的組織原則的方式，來處理和應對問題，而不是隨着時局的變動而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

理碰頭並談了一些事情，而被康生稱為「反黨黑俱樂部主任」。李則在會上批評康生迫害幹部⁴²。這一事件即為「二月逆流」。從這一時期的政治環境來看，李在2月16日之前恐沒有鼓動團中央機關的造反派批鬥胡的客觀要求。

不過，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在16日抗爭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並責成譚震林、陳毅等「請假檢討」。隨後，中共中央召開了近一個月的「政治生活會」，要求李富春等人輪流檢討⁴³。所以可以初步斷定，李富春講話應在2月19日之後。

另一個旁證是，大約在1967年4月初，李富春同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談話時，有人談到胡耀邦在「申訴」，李富春稱「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表現」⁴⁴。5月，李反而對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表示，「書記處的其他蓋子不揭，胡克實可以揭一下，對胡耀邦已經批了一下……至少是胡克實要批深批透，結合的對象要做好兩劃一站，觸及靈魂」⁴⁵。這一講話明顯是希望以轉向批判胡克實為名、結束批判胡耀邦為實。這一轉變其實源於4月30日，毛澤東為了以示對「二月逆流」的主要參與者的團結，約請他們到自己住處聚會⁴⁶。這恰好是李富春精明之處，他並無主動要批鬥胡耀邦之意，只是在隨着政局的轉變而對批鬥胡持不同的處理方式罷了，胡這時的命運很大程度取決於高層人事、政局的變化和文革運動的走向。

胡耀邦則無李富春的精明，反而在極端環境下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行為。胡被停職後，遭到了團中央各類戰鬥組的批鬥，繼而是北京各學校的揪鬥。在批鬥中，他多次

強調：凡是團中央書記處的錯誤，我承擔主要責任（頁109-10）。若是在平時，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中央領導幹部的場面話，但在文革初期這種極端的環境裏，胡保護其他團中央書記處幹部的含義是相當明顯的。

「實事求是」不僅體現在胡耀邦在批鬥會上的表現，還體現在他為別人所寫的外調證明上。1979年，高勇調回團中央組織部，負責整理共青團幹部在文革期間被迫寫下的檢查、思想匯報等材料，在整理胡的資料時，發現近百份他為各地的老幹部所寫的證明材料，胡一般都是先寫這些人在歷史上的成績、功勞和所受到的毛澤東和組織的表揚，然後才寫他們的錯誤、所受到的批評，而且所有材料無一份是給人扣「修正主義」、「叛徒」帽子的（頁118）。造反派要求寫他人材料的目的，多半是出於希望能夠從中得到「黑材料」，以便擴大他們的「戰果」；而遇到這樣的材料，則只能繼續批判他們眼裏「頑固不化」的胡耀邦了。

高勇的這些親身記述，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和胡耀邦處於「同一境界」。相比於李富春，胡在文革中的行為，從參加批鬥會到寫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以堅持中共相對正面的組織原則的方式，來處理和應對這些問題，而不是隨着時局的變動而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

四 餘論

高勇的這部回憶錄，其價值在於提供了諸多在歷史文件資料中難以看到的細節，本文只是選取了幾

個方面進行初步的解讀，不免要捨棄大量的細節和事例。

從胡耀邦在看文件、講話、寫文章和對待會議的方法和態度上，以及他在文革前期的遭遇和個人行為，我們可以看到他和他所處的時代艱難的關係，也有助理解他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引領改革風潮等政治行為的個人歷史根源。基於此，我們才能更好地解釋胡與其時代的真實關聯，不應僅僅着眼於他在中共黨內位置的升降帶動了他政治行為的變化，而是要注意到他個人的主觀選擇及其意義，而這一點恰恰需要我們將其放回到歷史的長河中才能得以浮現的。高勇的這本書為這一歷史浮現提供了史料的基礎。

從歷史的縱面來看，胡耀邦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其個人的政治選擇而言，並沒有因為環境的殘酷或優渥、政治地位的上升或下降而發生異化，他並不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因身居重位就突然表現出了可貴的個人品格。所以，我們還需要從胡個人的歷史根源考察其在獲得重要的政治地位後，發動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引領改革風潮之舉。對於這些歷史問題不能只着眼於權力格局的演變，亦需注意到個人的主觀意義和行動之於時代變遷的「歷史動力學」④。

因而，在胡耀邦的資料公布和研究還相對薄弱的今天，高勇的回憶錄所展現的史實，提醒我們既不應該陷入歷史悼念—假設批評的泥濘之中，也不應該落入基於今日現狀而生發出的改革—保守的二分評價體系之中，而是要回到歷史的場景，展現胡與中共、中國二十世紀

歷史的真實關聯。唯有如此，胡耀邦的歷史及對其時代的真實含義才能得以較為完整地呈現，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的若干問題才能得以進一步解答。

就中共黨史和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研究而論，胡耀邦的政治歷程和中共的歷史有着極為密切的交織，較為全面地研究和解讀胡耀邦，對於揭開二十世紀歷史的若干重大議題，都有着極大的幫助，譬如，長期被中共中央批評的共青團的「先鋒主義」問題、1975年鄧小平復出之後的短暫調整問題、文革後中共的思想解放問題、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問題、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共高層的權力更迭機制問題。不過，這些都只能留待於進一步的研究了。

高勇的回憶錄提醒我們既不應該陷入歷史悼念—假設批評的泥濘之中，也不應該落入基於今日現狀而生發出的改革—保守的二分評價體系之中，而是要回到歷史的場景，展現胡與中共、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真實關聯。

註釋

① 參見林牧：《日月昭昭——林牧自傳》，第三章，書包網，www.bookbao.com/view/201203/18/id_XMjM4MTIz.html。

②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929。

③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79。

④ 高勇：《胡耀邦主政團中央》（香港：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

⑤ 吳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香港：明鏡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7）。

⑥ 參見張黎群等主編：《懷念耀邦》，第一至二集（香港：凌天出版社，1999）；第三至四集（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

⑦ 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卷（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221-24。

⑧⑨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1272-73；1160-61、1166；1281。

⑪ 在此，僅就筆者所見的列舉數種，包括劉新章編：《胡耀邦》（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唐朝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胡耀邦逸聞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田國良、孫大勛主編：《胡耀邦傳》（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高原編：《胡耀邦在中國政壇的最後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河北人民出版社編：《胡耀邦》（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⑫ 楊中美著，倪克勤、商富才譯：《胡耀邦傳略》（北京：新華出版社，1989）；和氣弘編著，吳曉等譯：《胡耀邦》（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⑬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建黨七十周年作〉，載《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17。

⑭ 政協四川省南充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南充市文史資料》，第二輯，〈胡耀邦與川北區工作回憶〉（南充：政協四川省南充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

⑮ 紫紅霞、石碧波、高慶：《胡耀邦謀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

⑯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此書在2005年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時又以《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為題再版。

⑰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⑱ 曾慶紅：〈在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05年11月18日），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870371.html>。

⑲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⑳ 張黎群等主編，唐非撰：《胡耀邦傳（1915-1976）》，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㉑ 韓洪洪：《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㉒ 胡德平：《中國為甚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㉓ 中國科學院編：《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㉔ 沈寶祥：《親歷撥亂反正》（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

㉕ 李大斌：《1965：耀邦早春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

㉖ 李丹丹：〈中央黨校出書紀念胡耀邦〉，《新京報》，2015年4月17日，A20版。

㉗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3。

㉘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頁200-16。

㉙ 劉崇文：〈胡耀邦和我談下台前後〉，《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頁12-17。此文提及胡耀邦與李先念於1986年12月在上海會面，其實應在1986年11月18日。1986年11月8日到1987年2月13日，李以休息為名住在上海，其實亦是為了迴避北京方面為胡辭職而準備召開的黨內「生活會」及政治局會議。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李先念年譜》，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368。

⑩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293-97；亦可參見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206-208。

⑪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秘書手記》，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7-208、234-64。

⑫ 參見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卷（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205。據李銳回憶，其在當時的會議《簡報》上，似乎沒有看到胡耀邦有甚麼發言。參見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2010年1月20日），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001203585.html。

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18-20。

⑭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0-16；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74-93。

⑮ 余世光主編：《當代中國的青年和共青團》，下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42。

⑯ 參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191。《毛澤東年譜》中則沒有記述專門批評團中央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606。

⑰ 解學恭：〈八屆十一中全會日記〉，《炎黃春秋》，2015年第5期，頁52-53。

⑱ 參見《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卷，頁270-71。

⑲ 李富春：〈李富春對「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連絡人的講話〉（2012年4月10日），宣講家網，www.71.cn/2012/0410/614608.shtml。

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972。

㉑ 一個佐證是，1966年8月15日，李富春宣布胡耀邦等人停職反省，會後李又在小會議室裏肯定了胡在共青團的工作，要求保障胡等人的安全，有病要允許看病。參見滿妹：《思念依然無盡》，頁158；周寶興：〈李富春「文革」初期保護團中央〉，《百年潮》，2002年第2期，頁46-49。

㉒ 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666-68。

㉓ 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李先念年譜》，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408。

㉔ 李富春：〈李富春對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的講話〉（2012年4月10日），原載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宣講家網，www.71.cn/2012/0410/513725.shtml。

㉕ 李富春：〈李富春對團中央機關革命造反軍團的講話〉（2012年4月10日），原載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宣講家網，www.71.cn/2012/0410/512477.shtml。

㉖ 參見《李先念年譜》，第四卷，頁428。另一說法為4月29日，參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頁478-79。

㉗ 正如韋伯所指出的，個人的社會行動，往往可以通過其表現而附加某種主觀意義，不論這種意義是明顯的還是隱藏的，而這一行動又會顧及到他人的表現和自身所處的社會秩序。參見韋伯（Max Weber）著，閻克文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92-93。

李湘寧 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碩士
研究生

楊龍 《財經》雜誌新媒體編輯